

我一生最欣慰与自豪的是：

孩子们比我强，

孙子们比孩子们更强。

历代王朝的衰落与崩溃，

往往不是因为强大的国防，

而是因为奢侈挥霍和荒淫无度。

要家族长青，须牢记古训：

勤以静心，俭以养德。

自序

我生于1929年。从有记忆力开始，我所经历的就是战争，就是逃难，就是灾难，就是死亡与贫苦。生命的旅途就是颠簸，充满变数，前途总是渺茫莫测……

这与我目前的境遇完全是两极相反。

到2015年5月12日，我已在世上足足活了86年。我从未想过会活到这么久，全家四世同堂共96口人，还掌握这么多的事业。

20多年来，我偶有与新老朋友闲谈往事，多位友人都劝我写自传，特别是母校东南大学（前身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校长顾冠群先生。但我始终认为，天有不测风云，因前途未定而不敢枉自撰写。我的故事最好是待盖棺论定，再由别人执笔。

2014年春，定居美国的余洁龄兄弟邀我去中东做“《圣经》寻根之旅”。十二天的旅行中，我们朝夕相处，每天游览《圣经·旧约》中所叙述的古迹，沿途路上，博学广识的余兄弟随处给予很生动的解释，印证《圣经》的记载。我们早晚都享受神的话，得益良深。在旅途中，余洁龄兄弟总是引我闲聊往事，我也无章地随意叙述。想不到分手20天后，余洁龄兄弟竟寄给我106页的《李文正兄弟行口述记录》，阅后既高兴且感动。这本口述记录给我一个启发：或许我这一生87年的经历仍有引人入胜之处，更重要的是，能通过回忆往事，

起码让我的子孙知道今天我这个庞大的家族事业是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千辛万苦，经过一生坎坷才累积起来的。我希望能够让子孙们真正了解“勤以静心，俭以养德”的真谛。此外，我的父亲尽父职的故事和他的为人之道，或许可以感染我的子孙后代，期盼他们世代相传，都能尽责做个好爸爸或好妈妈，都能做个尽责的国民。

我经历了多次残酷的战争，这些经历让我一生向往和平。世界和平、社会和谐和家庭和睦是我最大的梦想，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努力引导家庭和睦、企业和谐、同事和同业间和谐，尽量做到尊重他人的立场，求同存异，可以殊途但要同归。我希望这本《自传》能够抛砖引玉，把这个理念提到更深一层和更丰富的范围。

这本书的写成，要感谢我的夫人和孩子们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也要感谢我的助理周鹏先生的校正工作和陈楷才先生的印尼语翻译工作。

我的经历分成五个阶段，每个阶段恰好是 20 年：

第一个 20 年（1929—1950 年）：艰辛和苦难的童年与青年时代

第二个 20 年（1951—1970 年）：与印尼共和国同步建设民族经济的时代

第三个 20 年（1971—1990 年）：在经济全球化大潮流中发展事业的年代

第四个 20 年（1991—2010 年）：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的时代

第五个 20 年（2011—至今）：成为子孙模范的老人时代

87 年一瞬间就过去了。历历往事，就像存积在档案室里没有整理过的记录文件，零乱无章。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自传，连写日记的习惯都没有，更没有写传记的经验。如何整理与叙述，其实真不轻松。

我一生的大背景

印尼于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随即发行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货币（ORI，OEANG REPUBLIC INDONESIA），逐步换回在日本侵占印尼时期日本军政府发行的钞票。当时荷兰占据的区域也发行了自己的叫NICA的钞票，所以从1949年到1951年期间，印尼的市面上同时有三种不同的钞票流通。当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货币因印刷低劣，易于伪造，所以市面上有大量的伪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货币钞票流通，加上8年半的连续战争导致生产低落、物资奇缺，由此引起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民不聊生。

1950年3月10日，印度尼西亚财务部部长Sjafruddin先生采取了货币改革措施，把票面5印尼盾（Rp 5）以上的NICA钞票予以腰斩，钞票的左边半张以票面额的50%照旧流通，而钞票的右半张按照票额的50%款额向印尼银行兑换40年期年息3%的国债。这一措施的目的在于统一印尼共和国的货币，同时借此增富国库，并减少货币流通量以遏止通胀。可惜，这一措施并没有伴以可行的经济建设计划，因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效，未能彻底改善印尼的经济困境。

印尼的独立是经历了5年的长期战争才从荷兰人手中夺回了政权，不像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独立是殖民地政府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打击后，无奈被迫以和平过渡方式给予各国独立。因此印尼民族更具政治意识，独立后出现了48个政党。从此印尼党争不休，政局不稳，极大影响了经济建设，导致金融颠簸、通货膨胀、货币贬值，9年以后，西亚里夫定的货币腰斩政策可以说是彻底失败。

1959年8月25日，印尼政府又一次采取货币改革措施，这次的措施是把钞票的面额减去一个零，即500印尼盾票额的钞票只剩下50印尼盾的价值，1000印尼盾票额的钞票只剩下100印尼盾的价值，同时客户在银行的存款超过25000印尼盾者予以冻结其存款。这次的货币改革目的主要是针对有钱阶层，可惜这项措施不仅把资金吓跑，而且国内生产滞后，经济大局混乱，从而埋伏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苏加诺总统是一位民族意识极强的政治家，他一生与殖民主义斗争，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思想使他倾向于社会主义。他在执政期间，极力提倡建国五项原则，潘查希拉（Pancasila）^①成为印尼民族的政治思想。他的外交策略是联合亚、非两洲曾经被殖民主义者侵略过的民族，共同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他倡议召开亚非会议并成立世界反帝国主义的联盟。印尼在苏加诺思潮影响下，于1963年与马来西亚及新加坡进行对抗，并且继续与荷兰殖民地政府抗争，夺回伊里安岛。苏加诺总统在这些政治议题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奠定了印尼民族的国际地位，加强了民族的自尊心。我们应承认，苏加

① 潘查希拉：词源来自于一个古老的印度教理想，是印度佛教的“五戒”，即古代印度的佛教徒用于描述道德经的五条戒律。1954年4月，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这一协定简称“西藏协定”或“潘查希拉协定”，因为协定的序言中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被印度称为“潘查希拉”。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也借用了“潘查希拉”作为自己的立国原则，因此“潘查希拉”既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代名词，也是印尼建国原则的代名词，即“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五项基本原则。

诺总统是印尼的民族英雄，值得我们骄傲，配得上我们的尊敬与赞扬。

但是另一方面，印尼的经济却陷入了困境。西方各国针对印尼政府采取了排挤、围攻和隔绝政策，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给予严厉打击，更使印尼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中。在 1953 年以前，印尼盾与美元的汇率是 1 美元兑 5 印尼盾以下；到了 1959 年，印尼盾已经贬值成为 1 美元兑 45 印尼盾；到了 1965 年后，印尼盾再贬值成为 1 美元兑 3 500 印尼盾；而到了 1998 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印尼盾对美元的汇率曾经贬值到 1 美元兑 18 000 印尼盾。

1965 年 12 月 19 日，印尼政府又进行了一次金融改革，把钞票的票额去掉三个零，换一句话说就是货币贬值为千分之一，这是印尼 1945 年独立以来连续经历的第三次货币大贬值，导致了循环性的通货膨胀。1966 年的通胀率已达到 650%，而银行的存款利息高到月息 20%，印尼的经济几乎陷入全面破产的境地。

1955 年到 1965 年期间，各政党之间争斗不休，几乎每一年都要换内阁，政局动荡，经济衰退，通货膨胀，银根奇紧，呆账成堆。因此，在 1967 年发生了一次银行大挤兑风暴，在 15 天内连续倒闭了 17 家银行，如果当时中央银行不出手相救，我相信印尼的所有银行都会倒闭。

尤其是 1998 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又侵袭了印尼的银行业，当时整个行业陷入万劫不复的状态中，连印尼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都陷入破产的境地，必须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银行（World Bank）出手援救。经济危机引发政局动荡，最终导致苏哈托政权倒台。

印尼独立以来，很多的时间都处在高通胀的经济状态中，最受

害的就是工薪阶层，特别是国家公务员。很长时间内，公务员每月所得薪水只够七天的开销，其余的就要靠变卖家里的旧东西过活。久了，家里的东西也卖完了，所以公务员身在办公室，心在惦记家里的亲人要么是病了无钱医病，要么是孩子没有钱交学费，物价天天涨，薪水又不涨，真是苦不堪言。这些公务员最后才发现，他们手上掌握的权力是可以卖钱的，换来钱后日子过得很好。于是一人做百人学，上行下效，从此印尼陷入官场贪污腐败的泥潭，这些腐败的官僚又加深了印尼经济的萎靡不振。印尼人民现在正通过 KPK（肃贪委员会）大力整治官僚的腐败行为，我深信这将是印尼独立以来的另一次胜利。

我一生的第三个 20 年经历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第四个 20 年经历了世界经济中心从大西洋盆地转到太平洋盆地的时代。面对时代的大转变以及印尼的政局动荡和经济颠簸，这些压力使得我养成了高度的危机感，前程似乎总是风云莫测、祸福未卜。但是我也从中悟出：危机就是生机的源泉，危机中总隐藏着巨大的生机。

印尼民族在过去的 65 年里，不论是经济或是政治都经历了大风大浪的考验，这似乎是一个民族成长过程的必经之路和百炼成钢的必然现象。今天，印尼民族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世界上最成熟的民主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第十大经济体，印尼正在迈进一个新的大世纪。

力宝集团是随着印尼共和国的经济与政治的成长而成长的，可以说是与印尼共和国共患难、同成长。几十年来，同样也经历了大风大浪，勤俭苦斗才有今天的力宝。

印尼共和国 65 年的艰辛历史就是我一生经历的大背景。我一生

的经历与印尼共和国的 65 年历史息息相关。这是我提笔写自传的起点与动力。

我一生的头 20 年是艰辛和苦难的童年与青年时代。我经历了四次战争，首先是中国的军阀割据战争，其次是世界二战中日本侵占印尼的战争，再次是印尼独立革命战争，第四次是在南京念大学时遇到的国共内战。战争给我的体验是残酷、破坏、饥饿、死亡。经过战争的痛苦，我彻底了解和平的可爱与幸福，也让我信守一生不与人争的哲理，确信忍让和解才是成功的根基。

第一部分

第一个 20 年（1929—1950 年）：
艰辛和苦难的童年与青年时代

将来用什么烧饭

我5个月大的时候，祖父（李进财）在老家福建省莆田县江口镇新店村病重，父亲（李亚美）带着全家从印尼东爪哇省玛琅县回老家探望祖父。不久祖父病逝，母亲与我留在家乡陪伴祖母。这一住就是6个年头，到1935年我们才回到印尼玛琅。在这6年里，旧中国地方军阀割据，战火连绵，社会动荡，白天怕军警，夜里怕土匪。新店村紧靠福厦公路，是兵家必经之地，村子里约有两百户人家，除了一家姓陈的外，其他全是姓李的。我家是从郊上村移居到新店村，到我父亲这一辈已经是第6代了。村子是一条长街，两端筑有堡垒，乡亲们轮流值夜防匪。印象中，村民都有枪械以自保，生活过得很不安宁，经常要逃到山上墓穴里躲避各派军阀的争战。在这个战火纷飞的情形下，慈爱的祖母催促父亲尽早把我们带回印尼。

祖父有一位哥哥叫李添丁，他的一位长孙名叫李文熙，攻读军校毕业后官至少校营长，是村子里唯一的军人。我有两个堂叔李仲芳和李青松，是唯一到上海受过高等教育的。我祖父是村里的第二富农，据说拥有大约30亩田地，家里祖业木匠，也经营放租，也就

是农村里的放贷业务。记忆中的祖母很有智慧并且威望很高，村子里的族亲们都很尊重她。

四叔给我讲过一段我小时候的事情。约莫 4 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很认真地问祖母：“咱们村子的人现在都靠山上的木材烧饭，但山上的木材几乎都要砍光了，将来我们要靠什么烧饭？”当时祖母很镇定地回答说：“孩子，你问得好。神造宇宙是完美的，已经为人做了完整的安排，树烧光了可以再生长，并且必定有其他的東西可以代替，你不用担心。”

我是家里的长子长孙，也是唯一的男孙，所以祖母最疼爱我，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生活，拣最好的食物给我吃。在家乡的 6 年，我几乎都是陪祖母睡，她庇护我，谁都不敢责骂我。1935 年当父亲要带我们回印尼时，我连着哭了好几天，拖着祖母不放，舍不得离开她。

有一天，祖母带着我去一个寺庙，那里很清静，风景秀美。我至今很清楚地记得她认真对我说：“孩子，家乡虽然很美，但是你看这里的人因为没有本领所以都很穷。你必须到外国去学本事，学好本事再回来，替家乡做事。孩子，出去是为了回来。”

我永远记着祖母这句话，“出去是为了回来”，但一直不明白其间真义。1990 年我又回到莆田，踏上故乡的热土，一刹那我终于悟出祖母想要告诉我的意思。家乡穷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工业是因为没有自来水和电。我决定邀请亚洲开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子公司国际金融公司（IFC）共同集资建设莆田湄洲发电厂，希望把湄洲湾建成中国的石化工业中心和钢铁工业中心。乡亲们在家乡的自来水厂大门前放置了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饮水思源”四个

大字作纪念，看到这四个字就想起祖母叮嘱我的那句话，“出去是为了回来”。

1935年，一家人历经千辛万苦又回到了印尼。同船百余乘客都是从厦门上船，在泗水港口上岸。泗水天气炎热，我们满身汗渍，必须耐心地排队接受荷兰殖民地政府移民官的审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红毛蓝眼、又高又大的白种人，他们都神情高傲、盛气凌人，把中国人当成犯人看待。当时我好怕好怕，天气又闷热，不由得想起祖母与家乡，我又哭了，妈妈抱着我安慰我，叫我不用怕。

到了玛琅我就去南强学校念书，认识了许多同学。其中有一位家里开餐馆，有一次在他家做游戏玩耍时，突然听到前面餐厅的荷兰人大吵大骂，原因是服务员端食物时把拇指压在了盘子上，荷兰人认为这是不卫生、不礼貌，但这在当时的印尼是很正常的事。那时，荷兰人经常会因为芝麻小事而闹事，因为他们自认是统治者，总想高人一等。

9岁失去妈妈的痛苦

我9岁的时候，妈妈怀上妹妹，那时乡下没有医院，妇女分娩都在家里请接生婆助产。当时一家人都在房外等待，只听妈妈在房里大声喊痛，听说是难产，父亲坐立不安，一家人都很焦急，但又无可奈何。最后妹妹生出来了，但妈妈却永远离开了我们，从此我就成了没有妈妈的孩子。父亲在屋中央挂了母亲的照片，摆设香桌，在七七四十九天中，他每天不到凌晨5点就早早准备了素菜，烧香

点烛，念经超度。父亲常呆呆地凝望亡妻遗像，独自流泪。七七过后很长很长的岁月里，父亲想起母亲仍常暗自流泪。

父亲从此既当严父又是慈母，他经常要替我补衣、洗澡，晚上又要催我放尿，凌晨 5 点必起床烧香念经，思念亡妻，然后督促我念书。下午从学校回家，稍微休息一下又督促我写一面小楷、两面大楷，教我临摹柳公权的字帖，并讲解关于中国文字的布局 and 结构。他说中国文字中每个字就是一幅画，只有懂得字的布局 and 结构后，再练习笔力才能写好中国文字，他也教我念尺牘学写信。在玛琅的兴化同乡，只有父亲懂得书写信函，因而每天都有乡亲带家信请父亲解读并复信，慢慢地我也熟悉了他们通信的内容以及彼此之间的亲戚关系。父亲指导我关于通信两方的身份、关系和称谓，他让我替乡亲们代笔，那一年我才 11 岁。能替父亲增光，为乡亲做事，我非常高兴。在学校里我是班长，也担任学校月刊的主笔。

一张彩票的故事

有一次听说买彩票可以发财，我用积攒的一盾钱换回一张彩票，时间到了我就注意查对彩票号码是否中彩。父亲看到后，怒气冲冲地把彩票夺去，在我面前撕碎，并打了我三下手，警告我：发财必须靠流汗，不可侥幸靠赌博、靠运气，不可坠入邪途。

父亲非常严肃地告诫我：不可接受别人的馈赠，接受馈赠就会欠下人情，就易受控于人；做人必须自在、自敬。他也常常训导我：赐比受更有福。有一次，三叔母送我一包小零食让父亲看到，他坚

持要我把零食还给三叔母。我衣服破了或者掉了纽扣，都是父亲在夜间替我缝补，鞋子坏了他也自己修理。空闲时他常常讲《二十四孝》和《陶朱公理财十二则》的故事。买连环画版的《三国演义》叫我看，然后才看《三国演义》的正本。父亲循序渐进地引导我研习中国文学和吸收中国文化。如果说今天我能有一些成就，这都是父亲的功劳。他真的是一个好父亲的榜样，我亏欠他太多太多。

日本军队的残酷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了印尼，我们第一次看到日本军人。他们在每个十字路口设立检查站，居民过街必须对日本军人行90度的鞠躬礼。经常有日本军人因看不顺眼就随意打人耳光并罚站烤太阳，日本人比荷兰人更凶，更蛮不讲理。

当时东爪哇玛琅县有62位兴化乡亲组织了福建兴化同乡会，简称为“福兴会”。福兴会在日军进驻后仍未解散，被日本军队误当作是中国的抗日机构——重庆的“复兴会”。有一天的凌晨5时，这62人同一时间被抓进监牢，父亲与三叔也包括在其中，他们被关了三年，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获得自由。这62位同乡经受了非人的酷刑折磨。据说这些酷刑包括拔指甲、走玻璃碎、反吊、灌水、毒打、火刑、饿肚、终日晒站、不让睡觉等。福兴会的主席卓克丁乡长被打死在牢中，其余的放出来后要养伤一年多才能恢复。

没有父母的小赌徒

父亲及三叔被日本军队抓去了，我就必须自立谋生。在日军占据玛琅期间，每条街道的居民必须轮流守夜。在守夜时我认识了 3 位比我年长十多岁的同乡，守夜无聊，他们赌牌为乐，亦教我赌牌，从此我夜以继日地跟那 3 位同乡赌牌。我赌输了，已经把父亲积蓄的一些金饰都输光了，还欠了一大笔赌债。这 3 个人每天到家里穷凶极恶地讨赌债，我受到威胁逃跑了，连续十多天都不敢回家。有一天，我跑到母亲的墓地痛哭，突然间我清醒了：这是一个骗局，是成年人骗小孩子的把戏。因为当时我才 12 岁，他们都已经都是二三十岁的大人了。想清了这点，顿时心里很踏实。我恨他们大人骗小孩，突然间勇气百倍，很从容地回到家中，开了店门，继续营业。不久这 3 个人就来了，很凶恶地向我讨债。我很镇定地痛责他们成年人骗小孩的恶行，警告他们：过去的事我不追究，希望他们从此不要再来，否则我将向在泗水的一位很有地位的叔公以及我的校长揭发大人骗小孩赌博的事情，并要求追回我交给他们的金饰品。我的理直气壮，竟把他们吓跑了，从此再也不来向我讨债。我这个没有父母管教的小赌徒从此得到解放，重新做人，一生不敢赌博。我永远记住父亲的那句话：发财必须靠流汗，不可侥幸靠赌博、靠运气。

我的校长罗异天先生

日军占据玛琅期间，只许有小学并必须加开日文课，每天早上

必须在操场举行升日本国旗并唱日本国歌的仪式。因为没有中学可念，所以只好留校，我小学毕业了三次。南强小学的校长罗异天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教育家，他的中国文学造诣很高。他教解古文很有经验，深入浅出，教了《左传》等书目。记得我很难掌握“而”字的运用，罗校长就在我的作业上写了这么几句：“应而而不而，不而而而，而今而后，而已而已”。看完我顿然领悟，掌握了这个“而”字的应用并体会到其中的奥妙。

罗校长也向我传授“三民主义”的真谛，我非常感兴趣。有一次我问罗校长人类为什么会有贫富之别？他借了一本《萍踪寄语》让我阅读，这本书是中国当时一位名记者邹韬奋先生写的。他叙述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黑人工人阶级受迫害的情况，然后再介绍关于帝国主义的可怕，亚洲人受迫害的情况。我深深地认识到：一个民族必须自强，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

日本进攻爪哇岛的初期，到处都发生抢劫，社会动乱，当时大家都说这是印尼原住民排华。可是罗校长告诉我，这不是排华，是因社会政权真空期而引发抢劫和动乱，是穷与富对抗的必然现象。我理解了。

到南京中央大学求学

1945年日本投降了，印尼宣布独立。独立革命战争在泗水爆发，与英国军队发生巷战。不久后，英军把泗水移交给荷兰殖民军政府，随后荷兰军队攻占了玛琅。印尼独立革命军就撤退到附近的村镇继

续抗击荷兰。当时在玛琅附近有一支印尼军队是由伊曼·苏卡尔多（Imam Soekarto）中校领导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他，结为忘年之交。有时我奉命到附近的荷兰军营侦察，回来向革命军汇报；有时也帮印尼军队到泗水买药品，我觉得工作得很有意义。

荷兰殖民政府计划分拆印尼，通过建立“东印尼共和国”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我听说有一位萧玉灿先生领导的组织决定阻止这个阴谋。萧先生发动东爪哇的华人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我立即响应这个号召。荷兰殖民政府对萧先生这个组织发动攻击逮捕，当时大约有一百多名学生被关进玛琅罗窝噶瓦鲁（Lowokawaru）监牢。我侥幸逃脱，离开印尼远赴南京。

在泗水的叔公李亚金交游甚广，介绍我认识一位在上海的姓陈的兴化人，他经营兴化的龙眼干、布匹和豆类，是一位很有实力的商家。与他相处了三天后，他介绍我去南京拜会当时国民党国防部的一位高级将官吴鹤云中将。当时我希望应考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但因我是在极度紧迫的状态中离开印尼的，匆匆忙忙中什么文件都没有带，幸亏经过吴鹤云中将的帮忙，网开一面，才得以参加考试，并最终经过面试被国立中央大学录取。这应该归功于父亲和罗异天老师的功劳，没有他们两位辛苦细心的教导，我绝对无法考进国立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当时刚从重庆搬回南京四牌楼，还是很凌乱，尚未进入正常状态。1946年美国士兵在北平强奸一名北大女学生引起全国大抗议，南京各学校也纷纷上街游行抗美，我也是积极参与的一分子。参加青年学生的抗美运动，让我的思想更加“左”倾。

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军阀残暴的侵略与破坏，经过8年的全

民抗日战争于1945年终于战胜日本，收复失地，全民欢腾。这时美国全力支持国民党并给予三百万大军的美式武器装备，蒋介石发动剿共内战。民心开始动摇，官员趁机贪污，经济失控，通货开始恶性膨胀，物价几乎每天上涨几个百分点，法币已贬值到无法流通的地步，政府被迫改发“金圆券”钞票，可是几十天后又不值钱了。政府又必须改换新的钞票“银圆券”，可是银圆券的寿命更短，只有一个月就失效了，市场拒收。老百姓只好进行易货贸易，物物交换，粮食开始短缺，民不聊生。

当时国民党政府拥有三百万美式装备的大军，竟然在短短两年内被相对弱势的共产党军队击垮了，淮海战役决定了国民党政府的溃败。战争逼近南京了，市内难民乱窜，治安已经失控，到处发生抢劫，加上货币失去价值，货品不流通，南京市都快断粮了。国立中央大学几乎已经停课，教师大多走了，学生也走了，宿舍里只剩下几个人，我们已经三天没有东西吃，只靠饮水止饥，天气又冷，真是饥寒交迫。新街口天天都有难民冻死在街旁，惨景实在无法形容。

在南京面临绝境的我举目无亲，徒叹奈何，突然想起荷兰驻南京的大使馆，灵机一动，现出一线希望，只好硬着头皮向大使馆求助。经过深入问诘之后，结局大出意料：我得到了大使馆的安排，离开困境到达香港。

战争是多么残暴、残酷，它是饥饿、贫苦、死亡的根源，从残酷的战地到了香港才体会到和平是多么可贵，发动战争的人有罪过，必应受到惩罚。在香港我向印尼驻港领事馆申请回印尼，但因为在逃难中我手上没有任何证件无法获批。辗转听说我的老战友伊曼·苏卡尔多先生现已是少将，担任印尼共和国驻缅甸大使，我于是写信

求他帮忙，他很讲义气，替我证明身份。我又回到了我的出生地——印尼。

在香港等候回印尼签证期间，恰好遇到一位乡亲李文珠，他很同情我的困境。当时他在香港一家亲戚店里工作，收留我晚上住在店里的桌子上，每天清早我必须赶到西环的市场里上厕所和洗澡。

丽梅的信救了我一命

在香港等待签证期间，白天闲来无事，就去逛书店或图书馆，专门拣反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书刊来研究《资本论》。因为这些反对的作者大多已经做过深入研究，我通过这些反对言论，来印证一些马克思的真正的资本论理论。我也和一些朋友共同切磋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些日子让我更坚定了我的理想，世界上的一切祸害都是由于帝国主义而产生，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拯救这个世界。经过一些朋友的鼓励，大家决定一起经过天津去延安，出发的船票都准备好了。

在没有动身之前，我写了一封信给爱人李丽梅。她先我一步回印尼，我每晚想念她，在梦里更想念她，实在舍不得离开她。但为了理想我又不能不离开她，心中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大家都说我瘦了。我一直盼望着她的回信，每天在看信箱，但总看不到信，心中难过到了极点，真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

奇迹来了，就在我准备出发去天津的前一天，丽梅的信来了，她说：她也每天在等候我的信，等待着我回印尼。她十分担心我去

了延安后再也看不到我，她没有力量去想象未来的事，只是无奈，无奈，永远无奈。

看了她的信，我心都碎了，整夜失眠流泪。第二天早上，朋友们催我动身上船去天津，那时正挂着三号风球，我叫他们先走一步，容我再考虑考虑。想不到半小时后风球已升为八号，我已经没有机会上船。那时狂风暴雨，实在可怕，不久一声巨响，有一条船被卷上岸，不一会儿又有一条船着火烧了起来，一整天后台风才过去。次日报纸刊出新闻：那条去天津的船因风浪原因，船内运载的化学品相相互碰击而失火，船上的乘客无一幸免全都遇难了。读完报上的消息我全身凉了一半，丽梅，感谢你，你的信救了我一命，感谢神的恩典。

我一生第一个20年经历了四次战争和五个朝代。9岁失去妈妈，11岁时父亲被日军抓去，我变成孤儿，必须自力更生，学习谋生。人生多坎坷，这是一个多苦多难的20年，也是一个难得的磨炼的机遇，让我识事体，有耐力，有理想，敢面对困难。我想：有危必有机，在苦难中总会隐藏着无限的生机。